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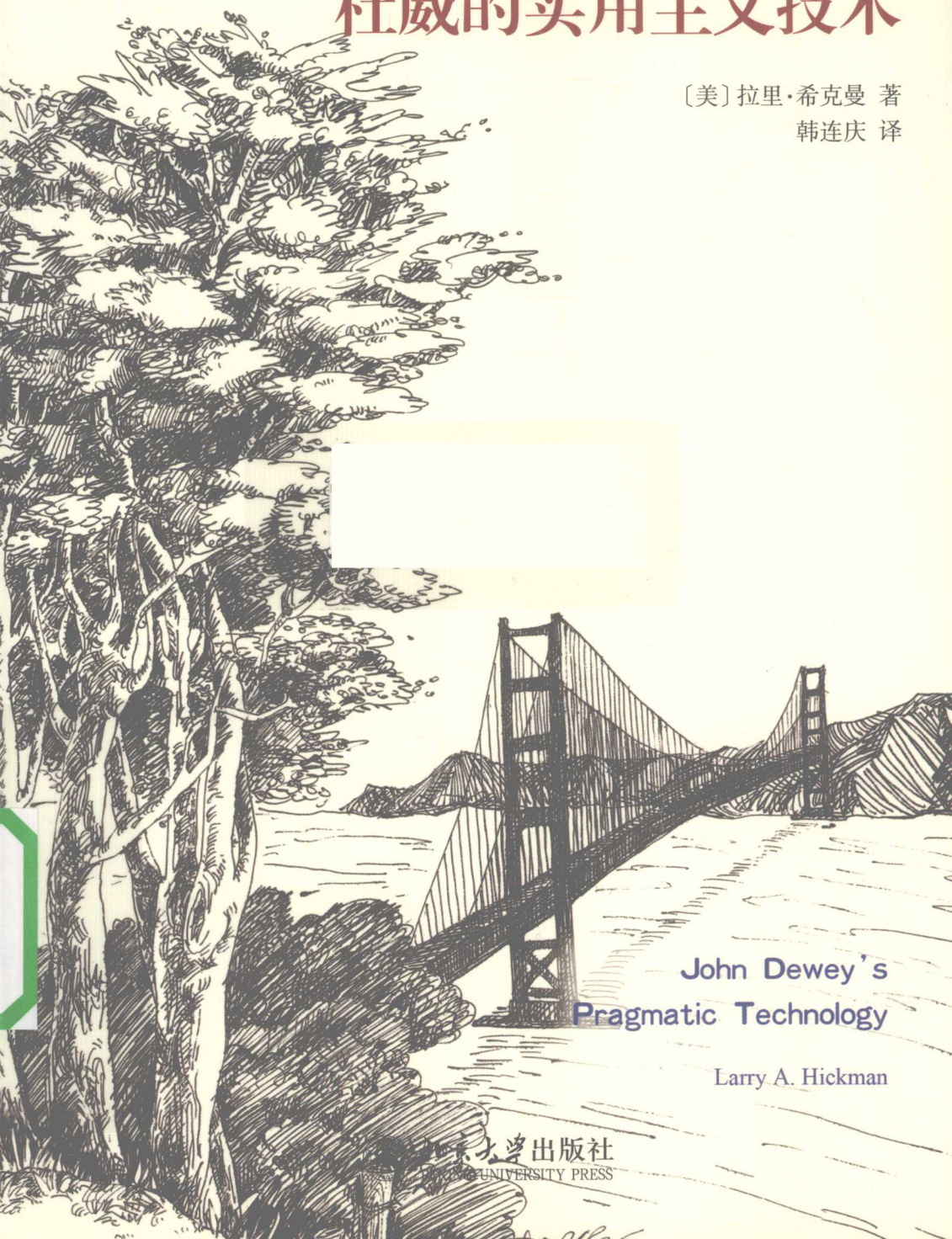


同文馆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

[美] 拉里·希克曼 著
韩连庆 译



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

Larry A. Hickm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

〔美〕拉里·希克曼 著

韩连庆 译



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

Larry A. Hickm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48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美)拉里·希克曼著;韩连庆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866-0

I. ①杜… II. ①希…②韩… III. 哲学思想-实用主义-思想评论
IV. ①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5228号

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 by Larry A. Hickman.
© 1990 by Larry A. Hickma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licens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publish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

著作责任者: [美]拉里·希克曼 著 韩连庆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866-0/B·08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9.25印张 300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误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风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①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②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③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④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①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②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④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⑤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他们将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⑥ 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我们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美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⑤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⑥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⑦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⑧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

⑦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一书中所论:在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高度重视。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中,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美国的大学当前也基本上是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⑧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20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开始的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

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⑨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⑨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中文版序言

约翰·杜威在 1930 年发表的论文《我相信什么》(*What I Believe*)中,对技术进行了非凡的描述。杜威拒斥了通常认为技术是“应用科学”的观点,认为“‘技术’象征着所有的理智技巧,自然和人的能量就能借此导向和用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技术不能局限于一些外在的和相对机械的形式。面对技术的可能性,传统的经验概念就显得过时了。”

从这段话中,有人首先注意到的是,杜威似乎回避了技术是好是坏的问题。他简单地声称技术是理智的。因为我们通常认识理智是好的,所以技术肯定也是好的。但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那些可怕的后果呢?如何看待全球变暖和核毁灭的威胁呢?如何看待有毒废物、地雷的扩散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前景?杜威怎么会不加限制地认为技术是好的呢?

当我们把杜威对技术的看法与其他著名哲学家对技术的评价相比较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破坏,由此威胁到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东西。20 世纪 50 年代,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技术造成的问题是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罢黜为用于各种类型的大规模生产的“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或原材料。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强调“交往”和“解放”行动的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以抵抗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s)的潜在影响。从这些值得尊敬的哲学家们提出来的可怕预言来看,杜威怎么会如此积极地看待技术提升人类生活的潜力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杜威认为工具和技艺(technique)不同于技术(technology)。杜威追溯到希腊语“技艺”(techne,也就是广义的艺术)和“逻各斯”(logos,也就是研究或探究)的起源。因此,在杜威看来,技术就是对我们的工具和技艺的探究,这就像地质学是对地球物质的探究和生物学是对生命形式的探究一样。杜威之所以认为技术是理

智的,是因为技术涉及到对我们用来控制周围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的便利和限制的工具和技艺不断进行批判和改进。

杜威认为,我们不能认为技术本质上是坏的,就像我们不能认为地质学或生物学本质上是坏的一样。不过,我们承认有时候会误用工具和技艺,由此造成了一些破坏性的、危险性的、甚至灾难性的情形。但是,发生这些情况并不是技术的过错。这种错误是由于共同体的理智没有克服贪婪、缺少远见卓识、软弱无力或者精巧探究的其他失败造成的。

这里的关键词是“探究”(inquiry),而探究嵌入在共同体中。当一些熟知的习惯、技艺或工具在一种新的情形中失效时,就需要探究。当探究成功时,就产生了新的东西:新的结论、新的习惯、新的技艺、新的工具。结果与出问题的情形恢复了协调。

当杜威告诉我们,技术“不能局限于一些外在的和相对机械的形式”时,他试图打破具体有形的工具和抽象无形的工具之间的传统的本体论的划分。在杜威看来,技术在概念和观念领域中的运作,就像它能够在手工工具和机器领域中运作一样。因此,杜威用对技术的功能理解取代了海德格尔和其他哲学家从本体论的立场看待技术的观点。这就从对事物**是**什么的研究,转向了对事物**能**做什么的理解,这就对我们理解技术的范围造成了诸多后果。

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杜威,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像其他一些学者那样,认为技术与生活和人类共同体的利益不相容。与此相反,应该把技术理解为一种人类的自然活动,这种活动就像我们投身日常生活、在艺术中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把共同体作为共同利益的表达工具、力图教育我们的孩子一样自然。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到工具和技艺的使用,这其中也包括社会礼仪。如果这些工具和技艺是按照包含理智的方式实施的,那么它们都需要“技术化”(technology)。这就是为什么杜威在把技术称为理智的时候没有回避问题。

杜威同时还告诉我们,这种对技术的理解使传统的经验概念过时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杜威拒斥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西方哲学传统认为,我们必须到经验之外寻找评价我们经验的标准。杜威认为,我们用来增进知识的标准,是作为我们制造和行动的

副产品而发展出来的。它们是作为工具而产生的,我们用这些工具达成与这些目标相互影响的各种目标,改变工具和目标的性质,产生新的材料、更好的工具和更有用的结论。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出版于1990年。这本书试图把杜威的洞见引入到哲学家和其他人对技术环境的讨论中。自此之后,技术哲学领域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例如,唐·伊德(Don Ihde)对技术的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的分析已经反映了杜威的很多洞见。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学生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哲学家,有证据表明,他现在已经非常明显接近本书提出来的立场。彼得-保罗·费尔贝克(Peter-Paul Verbeek)是新一代的技术哲学家,他号召直接把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海德格尔的“古典”的技术哲学“放入括号中”,转而在人类共同体中对“事物能做什么”进行功能性的评价,并把这种评价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

即使在本书首版近20年之后,杜威对技术的批判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杜威的中心议题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些议题没有充分获得认可,但是它们却逐渐出现在技术哲学的最前沿的研究中。

从1919年到1921年的26个月间,杜威走访了中国各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发表了演讲。很明显,杜威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可能从他对技术的论述中找到儒家思想的因素。

杜威把公共体看作技术造就的人工物,这样一来,他就认为通过探究方式建构和改造的关系模式(也可以称作礼仪实践)是为了有效地促进共同的善。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杜威和儒家思想都强调教育在共同体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教育基础,技术(对工具和技艺的探究)就不可能发展,而一个强大的教育基础反过来依赖于**态度**(attitude)而不是**制度**(institution)。鉴于杜威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他的思想如今在他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发表演讲的国家里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是非常适当的。

拉里·希克曼

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

致 谢

没有诸多人士的帮助,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我的同事约翰·麦克德谟特(John J. McDermott)的建议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所在院系的领导赫尔曼·扎特坎普(Herman Saatkamp)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和不断的鼓励。彼得·曼尼卡斯(Peter Manicas)和拉尔夫·斯利珀(Ralph Sleeper)的建议帮助本项研究步入正轨。拉尔夫·斯利珀、保罗·杜尔宾(Paul Durbin)、格雷戈里·摩西(Gregory Moses)、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rter)、格雷戈里·帕帕斯(Gregory Pappas)和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阅读了本书初稿,提出了不少建议,这有助于本书的最终完成,使本书更具可读性。

在我工作的南伊利诺伊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杜威研究中心”(Dewey Center),乔·安·博伊斯顿(Jo Ann Boydston)和她的工作人员提供了高效和令人愉快的帮助。特别是汤姆·亚历山大(Tom Alexander),他在我访问卡本代尔(Carbondale)时接待了我。丹·昂格尔(Dan Unger)帮助查找了书籍目录,韦恩·里格斯(Wayne Riggs)和埃德·加布里埃尔森(Ed Gabrielsen)耐心和勤勉地进行了校对和参考文献的查找工作。

本书的完成部分受到“国家人文基金研究规划部门”(Division of Research Program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的资助(项目编号 RH-20844-87)。该部门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德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文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的院长丹尼尔·法伦(Daniel Fallon)和副院长阿诺德·韦德里特兹(Arnold Vedlitz)帮助我从他们学院申请到了配套资金,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缩略语

本书引用的约翰·杜威的著作出自乔·安·博伊斯顿(Jo Ann Boydston)编辑、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杜威全集》鉴定版本(critical edition)。在本书写作时(1989年),该鉴定版本已经完成了5卷《早期著作》(*The Early Works*, 1882-1898)和15卷《中期著作》(*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晚期著作》(*The Latter Works*, 1925-1953)将最终包括17卷,到1989年秋天为止,已经出版了14卷。第15卷和第16卷将在1989年12月出版,第17卷也在编辑中。引文将按照标准的方式给出:丛书的大写字母后面是卷数和页码。鉴定版本的缩略语如下:

EW *The Early Works*(1882-1898)

MW *The Middle Works*(1899-1924)

LW *The Latter Works*(1925-1953)

其他通行版本的缩略语,包括那些鉴定版本现今还没有取代的版本,将在附录中列出。

目 录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1

中文版序言/7

致 谢/10

缩略语/11

导 言/1

第一章 定位杜威对技术的批判/6

第二章 认知作为一种技术人工物/29

第三章 艺术中的生产性技能/83

第四章 从技艺到技术:杜威对技术史的解读/110

第五章 理论、实践和生产/142

第六章 工具、历史和人类自由/182

第七章 公共体即产品/214

结 语 负责任的技术/252

附录1 原丛书主编序言/263

附录2 引用文献页码/266

索 引/274

译后记/288

当我开始郑重考虑写作本书时,我的同事约翰·麦克德谟特(John J. McDermott)提到了一个隐喻,后来证明这个隐喻非常有价值。他说,杜威的著作就像一张精心编织的蜘蛛网,它的节点和轮廓只有编织它的工程师才熟悉。杜威在这张网上能够运行自如。但是,对于试图横跨这张网,或者为这张网描绘地图的旁观者来说,就会不断陷入进退维谷的危险之中。

可以肯定的是,一篇好的导言所绘制的地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必须能提供有关这张地图所覆盖的领域的一般信息、汇聚在这张地图上的旅游路线、它对临近区域的重要性以及一旦参观结束后如何回到起点。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约翰·杜威对技术的批判,这是杜威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用超过 13,000 页篇幅的已发表著作所进行的一项规划。这里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杜威对观念论者和实在论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上争论的彻底重建(reconstruction);他对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描绘,以及对科学和技术相互之间现存关系的描绘;他坚持认为理论是一种实践;他把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体作为技术产品来对待;他洞察到美的(fine)艺术和地方(vernacular)艺术是技术连续统(continuum)的本质组成部分。杜威的技术景观的主要特征在于他认为,是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并使理论和实践相互沟通。在杜威看来,这些人工物既包括通常称为“精神的”那些东西,也包括通常称为“物质的”那些东西。杜威对技术的批判首先是一种对新奇的、可验证的(testable)人工物的生产的批判。

通向杜威的技术批判和来自杜威的技术批判的道路提供了与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美学、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联系。我一直试图在本书的每一章中为这些研究路径提供路标。

xii

本书是进一步研究的导引,考虑到并不是每一位读者的手头都有

杜威著作的鉴定版本,我提供了参考杜威主要著作的两种征引(citation)。例如,在《后期著作》第1卷(*The Later Works*, LW1)的参考页码之后,是《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 EN)的参考页码。当我只引用鉴定版本时,这或者是因为有关文章在收入鉴定版本之前没有重印,或者是因为有关文章在杜威著作的任何一种版本中都没有重印,而这些文章如今在鉴定版本中都能很容易找到。

为了使研究尽可能方便,我在本书最后提供了一个附录。附录包括我所引用的杜威著作的两种分页标记。第一种分页标记按照年代顺序和在鉴定版本中的页码范围,列出了我所引用的杜威著作。在这一栏的每一项中,也相应给出了在鉴定版本之前出版的那部著作中的出处。第二种分页标记按照字母顺序列出了所引用的鉴定版本之前出版的各类文献。这些文献在鉴定版本中都有对应的页码范围。

第一章试图参照杜威所处的时代、环境、他的哲学风格和他的学生、甚至一些批评者的观点来定位杜威对技术的批判。我认为,无法将杜威对技术的批判归入到目前对技术的最好分类中,例如由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和罗伯特·麦基(Robert Mackey)、亚历山大·伯格曼(Alexander Borgmann)提出的那些分类。杜威的技术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工具或设备跨越了心理和物理、内在和外在、实在和观念这些传统的界限。杜威将这一观念发展和提炼为一种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工具论。

第二章的焦点是杜威的探究理论。简单地说,本章指出,杜威将探究改造为一种生产性技能,这种生产性技能的产物就是认知(knowing)。杜威认为,只有相对于特定情况的探究所发生的处境,才能描述认知的特征。认知是一种生产出来的人工物,目的是为了影响或控制经验的范围,否则的话,经验就会被偶然所主宰。因此,认知是临时性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如果仍然需要控制,就需要进一步的探究。这种观点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探究的目标不是认识论上的确定性,而这个目标是自柏拉图(Plato)以来大部分哲学传统所追求的;与此相反,探究的目标是借助不断更新的人造工具,与新的处境不断地相互作用。

xiii 杜威不同于大部分技术哲学家,他认为技术工具包括非物质的对象,例